

**Mobility, Bordering, and the Contested Localness of the
Tea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Vietnam**

Po-Yi HUNG
Yu-Hsiu LIEN

**「越」界臺茶：臺越茶貿易中的移
動、劃界與本土爭辯**

洪伯邑
練聿修

本文是科技部計畫（計畫編號：105-2410-H-002-171；106-2410-H-002-180）與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永續地球尖端科學研究中心之成果之一，我們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意見，也特別感謝田野調查期間在越南與臺灣兩地所有提供協助的人。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電子信箱：poyihung@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電子信箱：lienyushiu2015@gmail.com

摘要

本文結合邊界(border)與移動(mobility)的理論取徑,從茶作為物在臺灣、越南之間的農技轉移與跨境貿易中,重新思索臺灣茶與越南茶之間貌似對立卻又互依的關係,並藉此再思考食物農業產銷中的本土所謂何物。越南茶與臺灣茶之間的關聯,隱含臺灣的南向政策、農技轉移,臺灣茶進出口市場的消長、食安議題、食農體系全球化與本土農業保衛戰等多層意義;同時越南林同(Lam Dong)省地區跨境農技移轉的茶葉地景,其生成與轉變背後有著臺灣、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動態過程下的臺越關係。臺灣茶的品種、製茶技術、產業經營者往越南跨境移動,當臺灣國內開始強化本土茶的意涵,從而形塑與包括越南茶在內的境外茶的對立時,邊界與移動的力道的確並存於臺灣茶與越南茶兼具互斥與互依的複雜關係中。要解讀境外越南茶與本土臺灣茶之間的互斥和互依,研究者必須參與到茶生產消費的日常生活中,從中獲取詮釋邊界與移動如何互為表裡的資料。茶的物質性牽起非線性的人與非人的組裝,讓越南茶鬆動臺灣茶的本土劃界,移動進入臺灣的通路,形成本土與境外,邊界與移動互為表裡的實作過程。

關鍵詞：邊界、移動、物質性、組裝、越南茶、臺灣茶

Abstract

Taking tea trade between Vietnam and Taiwan as an example, this essay aims to reconsider the re-localization of agro-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de)bordering and (im)mobilization in local food system (LFS). Starting from the early 1990s, a group of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nd tea merchants started their tea plantations and production in Vietnam, especially in the Province of Lam Dong. Instead of using the tea trees that originally grew in Vietnam, these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nd tea merchants transplanted tea trees of improved varieties from Taiwan. Additionally, they also brought along the whole “package” of processing techniques. In other words, they believed they also produced Taiwanese tea, whereas the production location was in Vietnam instead. In Taiwan, the “local” production of tea has declined due to a variety of reasons. Nevertheless, the market demand of tea has increased mainly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consumption of bottled teas, handmade tea drinks at chain stores, and the tea for touristic souvenirs. As a result, strong demand for imported tea, mainly from Vietnam, has increased to meet the growing consumption. However, the emerging ethos of LFS in Taiwan has created a discourse of local authenticity in agriculture, including tea production. In consequence, the decreasing local tea production in Taiwan has been labeled as the only authentic tea product of Taiwan. In accordance, many people regard Vietnamese tea, including those produced by Taiwanese tea entrepreneurs in Lam Dong, as a threat tarnishing the authenticity of local tea in Taiwa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in both Taiwan and Vietnam, we argue that the local food movement has been a circulation assemblage with an interface between border work and material mobility. From that, we problematize the emerging pursuit of a purified and essentialized local food, Taiwanese tea in particular.

Keywords: Border, Mobility, Materiality, Assemblage, Vietnamese tea, Taiwanese tea

一、序言與背景

本文結合「邊界」(border)與「移動」(mobility)的理論取徑，從「茶」作為「物」在臺灣及越南之間的農技轉移與跨境貿易中，重新思索所謂臺灣茶與越南茶之間貌似對立卻又互依的關係，並藉此再思考食物農業產銷中的「本土」所謂何物？

2015年4月，臺灣數家知名飲料茶業者¹原料接連被驗出農藥殘留超標，引起一系列衝擊整體臺灣茶產業的食安風暴。此次事件並非臺灣茶葉農藥殘留超標之首例，媒體報導、輿論很快和過去幾次越南臺茶²相關新聞進行連結（程遠述等 2015/04/23；ETtoday新聞雲 2015/04/23、2015/04/24）；但是在相關單位追查之下，這批農藥殘留超標的茶葉是來自南投的中低海拔茶區，對臺灣茶產業造成劇烈衝擊。國內茶農、茶產區政治人物紛紛出面自清（張振峰 2015/04/26）；也有越南臺商表示，已經減少臺灣市場比重，大多銷往歐洲、日本（邱莞仁 2015/04/26）；學者則建議，不只是茶葉，各類農產品都應該加強邊境檢驗（侯俐安、陳雨鑫 2015/04/26）；政府部門則表示臺、越茶葉外型相近，無法辨別，因此遭到立委批評（自由時報 2015/05/13）。於是，在一些人口中，越南臺茶品質低劣、以次充好，甚至以假充次；但在另一些人口中，又與國內茶外觀內質相去不遠，難以辨別。這場牽涉跨國貿易、農業政策與食品安全的爭議，儘管臺灣政府在當年8月時已經提出產地標示、邊境管理的對策（魯永明 2015/08/01），但是它的影響仍然在發展中，不僅尚未塵埃落定，甚至因隨後的國內茶負面報導而越演越烈（丁國鈞 2015/09/23）。

-
- 1 在林鼎盛(2007)、蘇怡如(2011)的定義中，飲料茶包含罐裝飲料茶、以及由茶館和泡沫紅茶式茶鋪所提供的茶飲。一般而言，臺灣飲料茶產業的起源是1985年上市的開喜烏龍茶，首創冷泡茶和加糖茶飲料；隨後茶飲料在1990年代超越碳酸飲料，成為臺灣飲料市場主流。
 - 2 越南茶產業主要分布在北部丘陵和南部林同省一帶，主要為紅、綠茶，並有少數調味花茶；出口到臺灣的部分則以紅茶、綠茶和烏龍茶（半發酵茶）為主，本文主要討論的是烏龍茶，其資金、茶種、技術、機器都是自臺灣轉移，生產基地集中在林同省一帶。

前述事件中越南茶遭到猛烈的抨擊，然而這並不是完整的越南臺茶形象。很多業者或媒體都提出不同的說辭，2012年的一則報導，就呈現了截然不同的越南茶形象，強調越南臺茶從人、茶種、機器到技術都是轉移自臺灣，在品質、安全與風味上都不遜於國內茶，最後更將越南茶視為臺灣茶產業未來出路的指標（潘美玲 2012）。這同時也是許多越南臺茶經營者，以及茶葉轉口貿易業者心目中的越南臺茶形象，他們強調臺灣茶產業的品種、機器和技術，是能夠跨越風土地理進行轉移，從而擴大整體臺灣茶產業的版圖與邊界。對越南臺茶經營者，以及與其貿易關係密切的茶廠、貿易業者來說，「爛茶」、「毒茶」都是片面、不實的指控，「混茶」的爭議則是對過去大量出口時期核心技術「拼配」的抹黑，更是臺灣茶產業發展方向的辯論。

根據越南臺茶經營者們的說法，臺灣茶產業轉移至越南應該起源自1980年代中期。在越南改革開放前夕，一名臺籍越南華僑和一間位在越南林同省的國營茶廠展開合作。儘管自法國殖民時期開始，阿薩姆種製成的紅、綠茶就被引進越南(Déry 2000; Phuoc et al. 2001)，但是當時缺乏技術，價格不高。於是回到臺灣招募相關技術人員，最後聯繫到熟諳技術的臺灣製茶師傅，投入技術、機器與品種的轉移。最初，因為臺灣茶葉和茉莉花成本高漲，他們用越南的茶、花做香片出口回臺，後來逐漸增加到八種產品。隨後越南改革開放、李登輝政府推動南向政策，以及臺灣國內製茶成本不斷上升，這批最早赴越投資的臺商靠著成本優勢不斷擴大在臺市場的份額。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後，許多投資者陸續相中越南南部的林同省作為茶葉的生產基地，1996年首度有臺商在此移植烏龍茶種。在1990年代，越南臺茶經營者往往包括了投資者與製茶師傅的組合，前者原先通常並非從事茶葉相關產業，但看好越南與臺灣茶產業前景，投入資金；後者則擁有製茶經驗和技術，成為臺茶轉移的先驅。不過，如同我們在第五節將會提到的，持有技術的製茶師傅不一定會久留，但是持有土地、廠房的投資者，在逐漸掌握茶葉生產技術，並與越南的環境與生產條件磨合後，構成了今日越南臺茶經營者的主力。時至今日，從寶路(Bảo Lộc)到大叻(Đà Lạt)，20號公路沿線都有臺資烏龍茶廠、茶園；而相關的品種、技術和機

器，也在部分臺商的有意推廣之下，逐漸擴散到越資茶廠。

在越南臺茶蓬勃發展的同時，臺灣國內的茶產業則進行了劇烈調整。1975年以後，政府、茶產業開始經營內銷市場；1982年廢除製茶廠相關管制，茶農得以掌握製作工具與技術，中小型茶廠迅速增長，這個以中小型為主的產銷體系更加有利於內銷取代出口的發展方向（邱念渠 2005；吳淑娟 2007）。2000年以後，臺灣飲料茶市場的蓬勃發展，更加刺激了國內茶葉消費，人均茶葉消費量隨著飲料茶產業蓬勃發展而提升，特別是對中低海拔茶區的需求（蘇怡如 2011）。但是在國內茶葉需求不斷擴大的同時，臺灣茶葉種植面積與產量卻逐年穩定減少；與此相對的，就是由包括越南臺茶在內的進口茶，逐漸成為支撐臺灣茶產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進入臺灣的越南臺茶，不易察覺但廣泛地流入臺灣茶產業的不同層級，包括少量而秘密地混入高價或比賽茶，或是作為中低價位沖泡茶的主力，以及部分流入飲料茶產業，風味上較為苦澀、不適單獨沖泡的原料茶。在越南茶進口量達顛峰的2014年，該年臺灣茶葉之國內產量、進口總量與自越南進口量分別為1.5萬噸、3.4萬噸與2.2萬噸；此後，儘管越南茶進口量在2015年的飲料茶食品安全事件衝擊下大減，也仍然高於國內產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日期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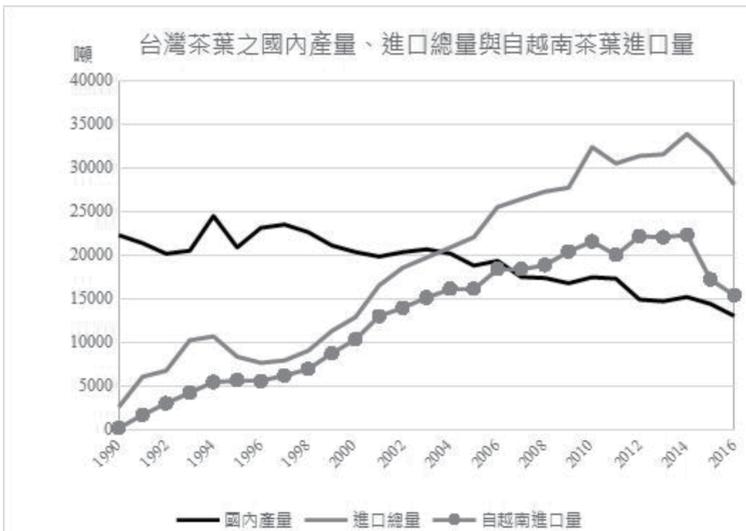


圖1：臺灣茶葉之國內產量、進口總量與自越南茶葉進口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日期不詳）

但是臺灣茶產葉對進口茶的需求，並沒有反映在越南臺茶種植者的經營策略上；實際上，根據許多越南臺茶種植者的說法，臺灣市場已經不值得期待了。1990年代李登輝政府推動南向政策，試圖轉移臺商投資對象，減輕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與技術、資金輸出，從而確保臺灣的本土性（李登輝 2015）；而當響應南向的茶葉種植者威脅到國內茶農、威脅到臺灣本土時，臺灣政府旋即加強對進口茶葉的管制。一則1995年的報導，援引臺灣政府的觀點指出，

行政院農委會昨天提出「臺灣茶葉產銷面臨之問題與展望」報告指出，臺茶的最大威脅是大陸茶和越南茶，爲了避免臺茶受衝擊而萎縮，農委會已建議經貿單位，貫徹大陸茶禁止進口的政策，並且設法蒐集越南茶園農藥施用情形，以加強進口檢驗，來達到減少進口的目的。（王淑瑛 1995/04/29）

此後，針對越南臺茶的負面論述開始大量出現。1999年政府部門再次公開提出越南「毒茶」論述，以越戰時期的落葉劑質疑越南臺茶：

標檢局表示，一般發展較慢地區農民比較缺乏使用農藥的正確觀念，越南進口的茶製品不但可能有殘留農藥；更危險的是，越戰期間，美軍爲了反制越共的叢林游擊戰，曾在越南大量使用化學武器，包括DDT、落葉劑、殺菌劑、DDE等化學物質，許多都是國際公約禁用或不易分解的有毒物質。（丁萬鳴 1999/06/10）

以此，臺灣的檢疫機構宣稱要強力檢核越南臺茶的農藥殘留與落葉劑殘留；直到2008年，才由茶葉改良場「官方地」證實越南臺茶並無落葉劑之疑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葉改良場 2008）。2000年則首次出現越南「混茶」論述，報導有越南茶出現在台灣茶比賽中——換言之，越南茶的品質已經足以滲透台灣的茶比賽了（陳紹聖、簡獻宗 2000/12/05）。

2004年底、2005年初，臺灣發生嚴重寒害，冬茶產量大減，相關業者開始擔憂進口茶、包括越南臺茶和中國茶搶占市場，或是混充臺灣茶出售（民生報 2004/12/12；陳紹聖 2005/03/14）；到了2005年7月，即出現一系列相關報導，指出越南臺茶以次充好，事涉交易誠信，呼籲政府出面管理（范振和 2005/07/01；張柏福、廖肇祥 2005/07/10；張柏福 2005/07/10）。自2005年開始，針對進口茶、越南臺茶的報導開始不再以政府立場爲主，而是大量援引茶產業相關人士的評論，越南臺茶的形象更加撲朔迷離。

2007年，受到越南臺茶進口逐年增加的壓力，其主要競爭對手、同屬低海拔茶區的南投民間鄉茶農不堪成本競爭，發起北上抗議活動，要求政府加強農藥檢驗，減少越南混茶的情形（張家樂、陳紹聖 2007/04/12；莊芳銘 2007/04/20）。這是繼前述1995年的報導，也是繼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越南臺茶進口蘊含的茶產業發展路線之爭首度浮上檯面。至此，報導中越南臺茶的形象更加撲朔迷離，有時是在臺灣茶農的技術轉移下，無論外型、口味和安全都不輸國內茶（呂天頌等 2007/05/16）；有時又是沿襲、再製其農藥殘留、甚至越戰遺毒的形象（張家樂 2007/05/29）。2007年中後則連續爆發兩起越南臺茶農藥殘留超標案件，引起消費者、政府和茶農對越南「毒茶」、「混茶」形象的大規模批評。2009年底，越南臺茶的負面形象再次躍居報章版面。11月底故宮販售的茶葉被驗出農藥殘留超標，事件上升到臺灣門面、形象之爭，起初懷疑是越南臺茶，查驗後逐步導向是國內茶葉出問題，最後不了了之（林進修 2009/11/16）。12月初，臺北縣消保官查驗茶飲料，發現其中多混有越南臺茶，儘管都符合臺灣農殘檢驗標準，但是拼配茶的混茶或假貨負面形象已經深植臺灣消費者心中（張明慧、張家樂 2009/12/12；孟祥傑 2009/12/11、2009/12/12）。除了重大農藥殘留事件之外，越南臺茶時常會登上報紙版面，即便並非全部是查驗出農藥殘留，例如在2012年總統、立委大選前，許多候選人紛紛對國內茶農處境表達關切（曾雅玲 2011/10/20；張家樂、紀文禮 2011/12/13）；2014年爆發同樣自越南進口的頂新油品食安事件，越南的落葉劑、戴奧辛殘留疑慮再次浮上檯面，甚至讓越南當局出面反擊（賴于榛 2014/11/04；Lam 2014/11/18）。從此，越南臺茶形象跌到谷底（周小仙 2007/07/27），越南「爛茶」、「毒茶」、「混茶」的印象至此深植臺灣。

由上述的脈絡背景得知，所謂越南茶與臺灣茶之間的關聯，隱含臺灣的「南向政策」、農技轉移，臺灣茶進出口市場消長、食安議題、食農體系全球化與本土農業保衛戰等多層意義；同時越南林同省地區跨境農技移轉的茶葉地景，其生成與轉變背後還有著臺灣、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動態過程下的臺越關係，當然也有著越南積極與區域市場經濟接軌的痕跡。

從1995年至今的一系列爭議，越南臺茶「爛茶」、「毒茶」、「混茶」的負面形象已經深植臺灣消費者甚至部分茶產業人士心中；但是對某些人而言，這顯然不是越南臺茶完整的樣貌。在此，越南臺茶負面形象的爭議，不只是食品安全的爭議，也彰顯出茶產業進口保護或開放市場的發展路線之爭，從中更反映出臺灣農產業近期在未來發展上的焦慮；而這個農業政策上的爭議，更反映了臺灣茶產業在全球市場與區域地緣政治的流變中，關於本土農業邊界劃立的掙扎；這些掙扎落入了一種政治地理學與政治生態學所批判的「尺度陷阱」(scalar trap, Galt 2008、2014; 另見 Brown and Purcell 2005)——均質化與浪漫化在地尺度的消費與生產（遑論何為在地？），也就是「越南茶＝食農全球化＝非環境友善＝毒茶」與「臺灣茶＝食農在地化＝環境友善＝好茶」的二元對立中。因此，在不落入尺度陷阱的思維下，對所謂越南茶的理解，必須跳脫與臺灣茶二元對立的想像；而從邊界與移動的對話作為理論工具，正是本文試圖打破越南茶與臺灣茶二元對立的取徑。

接下來的行文安排，我們將先從搭建「物」、「邊界」與「移動」三者對話的理論架構與方法；隨後分別進入「種茶」、「製茶」和「賣茶」的分析，也就是從生產端到消費端關於劃界與越界的實踐；最後再以「通路組裝」的概念收整本土、邊界與移動的交雜。

二、物、邊界與移動

（一）本土食農體系的劃界與跨界

食農產銷體系對本土生產消費的在地性，其實並不只發生在臺灣，而是世界各地面對全球化，針對食農生產鏈過度拉開生產與消費距離的批判。而所謂在地化的本土食農體系，在地理學家費根(Robert Feagan 2007: 24)的主張中，是包含在「在地食物系統」(local food system, LFS)中的，這是一個「對另類與對抗全球化食物體系的概括性統稱」，是對食物全球化產銷系統的反作用力。在地食物系統的其中一個特徵，便是將食物的生產

消費再空間化(re-spatialization)至在地的層次。同時，在地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我們必須更警覺地了解在地被框定與描述的過程(ibid.: 23; DuPuis and Goodman 2005)。要注意的是，我們認為，此處的「在地」與臺灣語境中論述的「本土」，在農業產銷上有重疊的意義。

的確，當前食物運動對抗全球化的相關倡議中，在地，或說本土，成為替代全球的標籤。不過，當本土的食物與農業逐漸被賦予環境友善、有機、風土、小農賦權、社區為基礎等意義，所謂的本土也可能成為另一個浪漫化的生產消費概念，忽略在地多元性和政治性的尺度陷阱(Galt 2014)。不論是本土抑或全球，尺度本身就是政治(Moore 2008)。

雖然在地食物系統被視為對抗全球化農食系統的一股力量，但對於在地 / 本土的批判性思考，也迫使學者、政策制定者、運動人士更為謹慎地看待浪漫化的風險。例如：古斯曼(Julie Guthman 2014)關注在地農食系統的社會運動中，出現的農業民粹主義者(agrarian populist)。費根(2007)則是敦促我們重新思考當過度強調在地 / 本土時，可能會造成我們忽略在地 / 本土劃界過程中的排除力量。

若本土化的食農體系，是希望透過邊界劃立的過程，排除全球對本土的入侵；在另一層意義來說，這個劃界的過程，也是對全球化下人事物大量且快速的移動進行的反思與反撲。也就是說，邊界化下對食農系統本土的固著，正對比於全球化下食農產銷的越界移動。然而，如同尺度陷阱這個概念所提醒的，本土並非本質化與浪漫化的想像，那麼我們就必須擺脫本土邊界化與全球移動性二元對立的思維，重新思索邊界與移動並非對立的兩面，而是體現當代食農體系的本土轉向，如何雜糅著既劃界又越界的操作；而本文正以茶作為物解讀劃界與越界的操作。

(二) 茶的物質性、跨界與劃界

在地理學，甚至擴及整個社會人文科學，邊界與移動都是兩個重要的理論分析工具(Newman 2006; Cresswell 2010; Heyman and Cunningham 2004)。邊界作為地理學，尤其是政治地理學重要的概念，時常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邊界為討論核心(Krishna 2003)，但當代因為科技發展與後

冷戰政經局勢，如新自由主義的帶動，許多人事物有更大規模和更快速地跨境移動，使得移動也成為地理學分析的取徑，藉以理解不斷更迭的空間關係(Adey 2010)。不過，地理學家們也意識到邊界和移動並非相互抵觸或各自獨立的概念，例如在思考移動如何被抵制與管制時，同時就在思索邊界如何被跨域與封鎖(Cresswell 2012)；也因此，邊界與移動實為互為表裡(interface)的兩個概念(Richardson 2013)。

近來地理學家開始試著把邊界與移動擺在一起談(Rumford 2006; Amoore et al. 2008)。然而，縱使開啓了兩者如何互為表裡的理論化過程，那些原本在地理學習以為常的談論焦點並沒有真的突破；尤其政治地理學中談邊界與移動仍拘泥在國與國交界的空間與人的跨境，以致於邊界仍無法跳脫以實體國界 / 邊界線(physical borderline)空間所在位置的討論(Jones 2010)，而移動則無法擺脫過度以國家中心(state-centric)或人為中心(agent-centric)的框架(Salter 2013)。必須強調的是，關於實體國界 / 邊界線、國家中心、人為中心的討論取徑並非不重要，而是當經驗現象不斷提醒：邊界的運作並不只發生在國與國的邊界線上，移動（或不移動）也不只是人，也包括物；這個時候，地理學家，甚至包括其他社會人文學科在內，都急切需要新的分析工具釐出新的理論架構，重新思索邊界與移動互為表裡的關係。

回到本文的主角——茶。當臺灣的茶品種、製茶技術、茶產業經營者往越南跨境移動，當臺灣國內開始強化本土茶的意涵，從而形塑與包括越南茶在內的境外茶的對立時，邊界與移動的力道的確並存在所謂臺灣茶與越南茶既互斥又互依的複雜關係中。然而這裡浮現了兩個問題：首先，茶作為物的特性如何在裡頭展現？再者，茶的生產與消費實踐大多不在國家邊界上，在人的日常生活場域，因此遠離邊界線的日常生活實踐又如何施展其臺灣、越南間劃界與跨界的力量？回答上述兩個問題，其實就是為了文章主角——茶——的出場，以新的理論架構搭台，搭一個跳脫以實體國界、國家中心、人為中心為討論取徑的台。針對第一個問題，我們從茶的物質性(materiality)下手；第二的問題也是個方法論的問題，我們從日常生活的邊界形構來談。以下分別闡述。

茶作為經濟作物在全球尺度的商品鏈上，從生產端到消費端無可避免地要經歷一連串跨國境的移動；但是如前所述，食農體系的本土保護主義作為對食農產銷全球化的反動，讓國家得以強化食農貿易的邊界管制。在跨國移動與本土劃界之間，商品的移動交織著市場力量與國家邊界鞏固的競合與協商(Walker 1999)，茶也不例外。因此，物質與人的移動在跨國的商品流動過程中存在不可分割性(inalienability, Sur 2013)。然而，若只是把茶作為移動或不移動的被動客體(object)，則隱沒了茶本身的物質性在跨界與劃界之間的作用；這裡我們所指涉的茶的物質性，包含了生產最前端茶樹品種的特性、製茶過程茶工藝的掌控、以及最終消費端如何穩定茶的口感以迎合市場需求打開通路。因此茶或甚至茶以外的許多食農商品，其物質性的發揮，都顯現在其作為商品從生產到消費不同階段的社會生命(social life)中(Kopytoff 1986)。

但是，社會生命的詮釋對商品社會性的側重，無法全然將茶作為非人(nonhuman)的特質涵蓋進來；因此我們從組裝(assemblage,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1980))的概念出發，用以理解茶的物質性在劃界與跨界交織中的位置。然而必須強調的是，組裝的概念複雜且各方皆有不同的解釋，解決這個概念本身的複雜性與爭議性並非本文的重點。即便如此，我們認為組裝作為理解茶的物質性主要在兩個面向：首先，茶作為非人角色，其能動性(agency)在於本身物質性的發揮；然而，茶的能動性無法獨立施展，必須與其他非人因子組裝，形成聚集能動(congregational agency, Bennett 2010)，才能展現出其對跨界與劃界的施為。另外，組裝強調雜揉著科技、政治、人與非人等偶發因子的非線性過程(Ong and Collier 2004)，才能回應茶在社會生命不同階段中，因為各種非預期的組裝而展現的跨界與劃界的能動性。

茶的能動性開展於從栽種、製程到銷售等不同階段中不同的組裝，因此穿梭在邊界的鞏固與鬆動之間；但是，臺灣茶與越南茶之間既跨界又劃界的過程，實則在茶生產消費的日常實踐中，藉以開啓日常生活中的邊界研究取徑。如同政治地理學者Reece Jones(2009: 184)所言，邊界研究

應該將目光從對國家的政治邊界與相關的社會邊界移開，從而關注生活中各分類化(categorization)的劃界過程，就像越南茶與臺灣茶的分類。於是近來地理學家更積極打破以往邊界研究鎖在鑽研國家實體邊界的困境，進一步把研究焦點推展到人們日常生活尺度中更多樣的非國家行動者(non-state actors, Jones and Johnson 2014)，比如本文中的茶。但是，本土化邊界(vernacularization of borders, Cooper et al. 2014)並非否定國家實體邊界的重要性；相反，這樣的研究策略更能解讀國與國的實體邊界，如何從遠離國家邊界的日常生活實踐中物質化(materialize)國家邊界的力量，也就是本文中關於境外越南茶與本土臺灣茶之間的互斥和互依。要解讀境外越南茶與本土臺灣茶之間的互斥和互依，研究者除了蒐集國與國實體邊界管控的資料，如海關的農藥檢驗外，也必須在實體國家邊界空間之外，參與到茶生產消費的日常生活中，從中獲取詮釋邊界與移動如何互為表裡的資料。以下簡單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

三、研究方法：置於日常的邊界化與移動



圖2：本文田野地點位置圖

本文的研究方法，包含田野工作與檔案資料蒐集兩個部分。田野工作

的部分，則包含越南的移地研究與國內的訪談、資料蒐集。我們在2015年7月、2016年6月到8月間以及2017年8月總計四次赴越南進行移地研究，除了前述越南中部高原南端林同省有較密集的烏龍茶產業，也到越南北部邊境方興未艾的臺資茶園進行調查。本文移地研究的訪談對象，包括先後投入的越南臺茶經營者、日益減少的臺籍製茶師傅、逐漸增加的越資茶廠、以及烏龍茶生產及貿易相關的其他業者。這也同樣是本文研究限制之所在，因為語言和經費因素，我們難以觸及越南茶工、大多數的越資茶廠或是地方官員；而我們能夠接觸到的越資茶廠，侷限在少數中文流利的越南華人經營者。實際上，根據已經蒐集到的資料所示，截至目前，臺越之間的烏龍茶貿易，仍然是以臺灣背景的經營者、茶農、茶商與茶業改良場的技術官僚為主要行動者；相對的，逐漸起步的越南烏龍茶內銷市場，則主要由越資茶廠把持。

越南臺茶的種植、製作，主要集中在林同省20號公路沿線的寶路(Bảo Lộc)、夷靈(Di Linh)、德重(Đức Trọng)、林河(Lâm Hà)、大叻(Đà Lạt)等地。根據臺商商會林同分會的資料，2015年共有26家會員從事茶葉種植、製作、銷售、採購，以及農藥、肥料、機器、其他耗材等茶產業相關的經銷。筆者透過關鍵報導人，也就是接下來文中阿伯、阿姨和阿湧一家人的引介，在2015到2017年的四次移地研究間，與13家越南臺茶經營者進行了超過20次的訪談；並且在關鍵報導人的茶廠，針對製茶過程進行總共約兩個月的參與觀察。我們的關鍵報導人是目前最資深的越南臺茶經營者，過去曾經擔任臺商商會林同分會會長，其經驗及關係網絡應具備足夠的可信度與代表性。

除此之外，越南臺茶作為臺灣茶產業中隱晦不見、難以識別、卻又無所不在的物，並非只有越南臺茶經營者才會討論。在臺灣各地的茶展、茶店或茶園裡，國內茶農、茶商，也經常召喚與回應越南臺茶的負面形象，藉以界定自身的獨特性與價值。這個自身的尺度，可能是指整體臺灣茶產業，也可能是該經營者的產品。這些國內茶農、茶商也許沒有和越南臺茶直接接觸的經驗，甚至並不明瞭負面形象的詳細內容。但是論述越南臺茶

的負面形象，經常被國內茶農、茶商視為能有效召喚消費者共鳴與消費欲望的行銷方式。因此除了移地研究之外，我們同樣也在臺灣的茶園、茶店或茶展中，觀察越南茶如何不知所在、卻又無所不在的現象。最後，為了確保不會洩漏受訪者的身分，本文所有受訪者皆代以假名；一些比較具爭議性的訪談內容，則會用更扁平的代稱，避免該受訪者的身分被其他越南臺茶經營者察覺。

除了針對茶產業行動者們的訪談，為了將本文的視野延展到日常生活化的邊界運作，本文的移地研究也包含針對種茶、製茶與賣茶等不同環節的參與觀察，試圖了解行動者們如何在每日實作的層次參與邊界穿越與鞏固的組裝。是以，我們的移地研究除了透過訪談蒐集之外，不同受訪者之間、以及經營者與茶工之間的互動同樣十分重要，技術轉移、市場動向的交流往往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在我們的移地研究過程中，經常可以觀察到受訪者之間同時也在交流最近的資訊，包括副產品技術、製茶機械的差異、近期茶葉的品質好壞、之後的農藥檢驗政策；或是臺灣經營者與越南茶工如何磨合關係、磨合安全與品質的實踐。換言之，在進行前兩題所需的訪談時，我們也同時身處在越南臺茶的關係網絡中，觀察不同經營者如何涉入邊界運作。

檔案研究包含三個來源，分別是報章媒體論述、史料蒐集和越南臺灣茶產業經營者留存的資料。整理歷年來越南和臺灣茶產業食安事件的新聞報導、書寫方式，將有助於了解越南臺茶負面形象的演變過程。此外，本研究的檔案蒐集也包含越南方面對於臺灣茶農、商、品種、資金和技術轉移的記載，了解不同觀點下的越南臺茶發展歷程。史料蒐集的部分則是回顧臺灣茶產業相關書籍、刊物、專著，整理其中對臺灣茶產業發展過程的描述，特別是處理到越南茶、進口茶的部分。本研究使用的史料除了《茶業專訊》等相關出版物之外，由徐英祥翻譯、製茶公會在2011年出版的《臺灣茶業調查報告譯集》提供大量日治時期的官方記載，有助於更細緻地理解戰前的臺灣茶產業，同時也是相關研究尚未處理、使用過的史料。為避免單方面採信官方文獻的風險，越南茶業臺商留存的檔案，包括照

片、公文、相關認證或其他記錄也會是本文檔案研究的範疇，以蒐集越南臺茶發展過程的相關證據。

四、種茶：品種特性與農藥管制

在越南與臺灣茶之間的諸多差異劃界與跨界中，食品安全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廣為流傳的爭議。越南臺茶的食品安全隐患，包括農藥或是落葉劑殘留的指控，可以概括理解為針對越南臺茶種植過程的不信任。這些不信任透過買賣之間的耳語或媒體報導的傳播，被建構為越南與臺灣茶之間的本質差異。除此之外，食品安全的不信任也經由臺灣海關的農藥檢驗機制，實體化為越南與臺灣茶之間的邊界。

但是，儘管國內行動者不斷投入鞏固邊界、促使邊界封閉的行動，越南臺茶卻能夠不斷穿越食品安全的邊界。以2016年的資料為例，進口茶的農藥殘留超標約為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2016），而國內農藥殘留超標的比例約為3%（凍頂工作站等 2015）。甚至有越南臺茶經營者透露，某些臺灣的茶葉轉口貿易商寧可選用越南臺茶，因為越南臺茶除了自行檢驗以外，還有海關檢驗把關；相較之下，國內茶原料端農藥檢驗的落實情形，至今仍是眾說紛紜。以食品安全的象徵邊界，封阻越南臺茶進入臺灣的努力似乎尚未實現。何以如此？

（一）品種的物質性

若是將越南臺茶的食品安全隐患，放在農藥使用的研究脈絡上，或許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此處的邊界運作情形。這個對於農藥使用情形認知上的落差，被高特(Galt 2008)稱之為「農藥矛盾」(pesticide paradox)。高特發現，在一般的認知，以及過去的研究中，普遍相信非傳統出口型作物(non-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xports, NTAEs)³的農藥使用情形會比傳統的內銷作

3 在本文的案例中，越南臺茶與國內茶相比，具有明顯的非傳統出口型作物特徵：是晚近20年左右移植、適應的物種/品種，並且也以出口為主要銷售目標。

物更加氾濫。但是高特透過其在哥斯大黎加的採樣分析發現，這樣的比較不僅不對稱，甚至結果有時會出人意料。一方面，不同的作物種類理所當然需要不同的農藥使用；另一方面，外銷作物爲了因應管制風險，往往必須執行更精細的農藥管理。因此，高特歸結出三個考量農藥使用情形時不能忽視的因素：品種特性、市場價值與管制風險。其中，品種特性的考量，扣合了本文對物質性與邊界運作的考察。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越南臺茶的品種特性，如何影響越南與臺灣茶之間的食物安全邊界運作？

要探究越南臺茶的品種特性與食物安全的關係，首先必須追溯到1990年代，臺灣經營者展開茶種移植之初。1990年代，越南臺茶經營者們開始投入品種、技術引進之初，發現當地除了臺灣常見的椿象、紅蜘蛛和小綠葉蟬等蟲害，最嚴重的是一種他們稱之爲蛀心蟲的蟲害。根據越南臺茶經營者們的說法，蛀心蟲進入茶樹之後，會沿著枝幹內部一圈一圈、螺旋狀的向上蛀蝕，成蟲之後才離開茶樹；屆時，茶樹的養分輸送遭到嚴重的破壞，往往也經不起折騰，產量大減，甚至枯死。

根據農委會茶改場的資料，前述的蟲害情形應該和咖啡木蠹蛾(*Zeuzera coffeae* Niether) 或茶彫木蛾(*Casmara patrona* Meyrick)相似⁴。這些所謂的蛀心蟲，在1990年代初期，讓那些最早投入臺灣烏龍茶種移植的前輩們頭痛不已。在移植之初，經營者們考量到臺灣茶市的偏好，因此以青心烏龍爲主要的品種。但是，即便在臺灣的生長環境，青心烏龍也是十分嬌生慣養的茶種，初來乍到越南時，更是死傷慘重。因此，儘管青心烏龍在臺灣茶市具備價格和口味偏好等諸多優勢，越南臺茶經營者們也只能將技術轉移的目標，轉向臺灣烏龍茶的其他品種。

在許多臺茶品種之中，越南臺茶經營者們最後發現，臺茶12號、也就

4 初孵化的幼蟲自幼嫩枝條或嫩芽鑽入，沿木質部蛀食，形成一橫環食痕，因水分不能上升，被害植株上部枯萎，幼蟲沿髓部向下蛀食，把木質部吃掉，形成隧道，穿入粗莖，在幼木茶樹，此隧道可能直伸入主根，受害枝條枯萎，枝幹逐漸枯死。成木若僅有一枝條受害則影響不大，但在幼木茶樹，若主莖受害，則導致全株枯死，影響甚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2004：47）

是俗稱的金萱、二七仔，比其他品種更能適應越南的生長環境。根據臺灣的專業茶產業技術機構、茶業改良場的資料，金萱具備「芽密度高，樹勢強，高產，採摘期長，抗枝枯病」等特性。在越南的茶業技術文獻中，記載了金萱於1994年引入，特色為早發、生長力強、產量高、抗蟲害能力強、抗旱能力普通，茶樹為分岔、叢生、密集、的灌叢(Ngoc 2012)。臺灣茶市起起落落，價錢最好的始終都是青心烏龍，其次才是金萱、翠玉、四季春等不同品種。這些品種，今日在林同省茶區仍有種植，但大多是在價錢起落時，用以拼配出不同的風味，分散風險。唯有金萱適應最好，種植面積最大、產量最大。茶園管理得宜、做出奶香的金萱，能夠單賣出尚佳的價錢；品質稍次的產品也能用作拼配的基底，偶爾也會有意想不到的風味。在參與邊界運作之前，越南臺茶和經營者們必須先在越南站穩腳跟；而金萱的品種特性，就是越南臺茶發展的基礎。

在金萱的諸多品種特性中，讓金萱最接地氣，使其稱霸林同省茶區的，是它分岔叢生的枝幹。被蛀心蟲侵入之後，因為各枝幹分岔叢生、獨立生長，金萱的枝幹仍然能夠繼續生產茶葉，而非依賴大量殺蟲劑。相較之下，無論是臺灣的青心烏龍與其他品種，或是越南當地的大葉種阿薩姆茶樹，都是從單一主幹出土後分岔，因此為了避免茶幹遭受蟲蛀，施灑殺蟲劑實屬必要。

金萱茶的品種特性，也讓越南臺茶經營者們在邊界運作生變時，可以更有彈性地進行農藥管理。在年景不好時，部分經營者選擇停用部分茶地的農藥，減少產量，降低成本。2016年，整個林同省茶產業可謂一片蕭條。先是2015年飲料茶農藥殘留超標事件後，新的政策讓越南臺茶經營者們被迫更進一步讓利予盤商；隨後民進黨政府和中國關係僵化，高度依賴陸客消費的臺灣烏龍茶市需求大減。最後，在2016年初一場乾旱來襲，讓原本就缺水的茶地大受打擊，甚至讓當年全越南最早投入臺灣茶種的茶

5 參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之〈品種特性簡介〉，日期不詳，<https://www.tres.gov.tw/view.php?catid=1668> (2017/09/21瀏覽)。

地整片枯死。於是，越南臺茶經營者們紛紛減產，部分茶地只維持基本的農藥、澆水。吳老闆是農場的第二代，茶樹、茶廠都是他十餘年前剛來的時候所投資的；2016年吳老闆看茶市太差，就乾脆讓樹齡十餘年、有點老化的第一批茶樹、茶地休息。如果換作青心烏龍或是其他臺茶品種，經營者們可能就無法作出停產、減產的決定，單是維持茶樹存活所需的基本農藥、肥料和勞動力成本就會讓經營者們難以負擔。金萱的品種特性，讓越南臺茶經營者們可以更有彈性地面對越南與臺灣茶之間的邊界穿越與鞏固。

金萱的品種特性，也許不是直接地讓茶樹植株在面對蟲害時更有抵抗力，也不是越南臺茶農藥管理的唯一因素，但是卻讓越南臺茶經營者們得以更有彈性地在產量、蟲害與管制風險間進行農藥管理。不過，品種特性只是越南臺茶穿越邊界的其中一環，誠如高特(2008)的說法，市場價值和管制風險同樣引導著茶園前線的農藥管理。因此，接下來我們要繼續探討的問題是：市場價值與管制風險，究竟又是如何涉入越南臺茶的農藥管理，進而成為邊界運作的其中一環？

(二) 農藥管制

儘管農藥——殺草、殺蟲、殺蟎、殺菌劑——的使用，可以在品種特性的考量下減少，但現實是，所有慣行農業都無可避免地需要使用農藥。因此，對越南臺茶經營者而言，重要的是如何追蹤、緊跟臺灣和其他可能市場的農藥使用規範？並且，在掌握農藥使用規範以後，又要如何確保田間的農藥使用？

在越南臺茶跨越邊界，進入臺灣之前，它們都要面對海關的農藥殘留檢驗；而在通關之前或之後，許多中下游的買家、盤商，也會要求越南臺茶經營者提供農藥殘留檢驗報告。前文提及的品種特性讓越南臺茶經營者得以彈性地使用農藥，但是在面對海關檢驗，或是盤商、消費者時，他們需要的是精細到百萬分濃度以下的農藥管理，例如海關檢驗結果，或是自行送驗的報告書。面對農藥管理的問題，越南林同的臺商們發展出了一大一小兩種不同的解方，確保茶葉產量，並且能順利通過海關。而這一大一小兩種模式，帶出了越南臺茶的關鍵要素：大規模生產下的生產模式與勞動力體制。

第一種走的是「大」的路線，也就是早期的越南臺茶經營者，在市場與自然環境影響之下，衍生出的生產模式與勞動力體制。這個所謂的大，是相較國內茶產業而言的。在臺灣，最具代表性的高海拔茶葉一年兩到三穫，中低海拔茶區才能有四次以上的收成；面積的部分，茶地絕少超過十甲；勞動力各茶區有所不同，大多透過茶區內的換工，或是外包予跨茶區的採茶、製茶班解決，大規模集中生產的茶廠已經寥寥無幾。但是在越南林同省，茶葉一年七穫，一次生長季近五十天，幾乎等於全年無休。再者，許多歷史較久的茶廠規模都極大，小則二三十甲，大則超過一百甲，產季時一天必須採收、處理四五噸茶菁。全年無休的茶季和大規模生產，讓越南臺商不可能延續國內各茶區的勞動力模式，依靠換工或茶班巡迴採茶、製茶。越南臺商得以、也必須維持一個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以一間歷史較久、規模龐大的茶廠來說，在逐步機械化之前，茶園和茶廠共有三百多名茶工；到了近年，隨著各式機器普及，茶工人數逐步縮減為一百到兩百人。即便如此，越南臺茶龐大而穩固的勞動與生產規模，仍然不是國內茶產業可以度量的。

這樣的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讓越南臺茶在過去20年內，得以透過臺灣茶市中低價端的豐厚利潤，轉化為緊跟各式規範所需的條件。以農藥來說，就是有幾家茶廠可以聘請文書處理人員負責農藥管理，包括臺灣乃至幾個潛在出口國的農藥規範追蹤，以及目前茶園內的農藥管理。2015年，第一次移地研究即將結束，離開茶廠下山的前一天，報導人阿湧遞給我一大本剛影印、裝訂好的農藥殘留規範，「這是我們會計整理的，現在臺灣的農藥殘留規範，給你們帶回去參考一下」。農藥殘留規範平常當然沒有必要印出來，阿湧讓茶廠會計裝訂成冊，其實就只是想要證明：無論臺灣的海關檢驗如何頻繁，農藥殘留標準如何嚴苛，越南臺茶當然是有能力緊緊跟上的。林同省的一間越南臺茶廠，是臺灣某集團在越南的子公司，在通路無憂的情況下種植、製作，規模甚大；茶廠裡面的員工，會定期更新臺灣、乃至其他幾個潛在市場的農藥檢驗規範，以此調整茶廠的農藥施用情形。該廠的經理讀的是農專，他不僅對越南臺茶的農藥管理有信心，甚至認為國內茶農的農藥管理，在缺乏專業管理與鄰園污染的風險下

更沒保障。臺灣國內的農藥管理和檢驗究竟如何落實，不是本文的主題，也不會在此深究⁶。另一位洪老闆則是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茶地通過歐盟有機認證，他除了聘請專人確保農場管理符合特定流程，也長期和當地的農業學校進行合作。對於越南臺茶經營者而言，自家更大的生產規模所支撐起更龐大的勞動力編制，以及其中蘊含更多的專業人才，讓越南臺茶的農藥管理更加可靠，在面對食品安全的差異劃界時，也能順利穿越邊界。

這樣看來，越南臺茶似乎顯得有點財大氣粗——其實不然，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只是其中一種經營策略。維持大規模的勞動力編制面對邊界運作變化時，其實很難進行調整，茶市不佳的時候，就是很大的負擔。另外，許多2000年以後赴越投資的經營者，在土地取得、租用上，往往不如1990年代的先行者們順利，自然也無法套用前人的生產模式。因此，越南臺茶經營者的另外一種生產模式與勞動力體制，以及相對應的農藥管理，就是走較「小」的路線。2000年以後，一方面臺灣經營者投資漸趨飽和，另一方面越南當地農民的咖啡種植面積也不斷擴大，晚來的越南臺茶經營者的茶地規模往往只有數十甲。這些茶地規模小的經營者，除了自家的茶地之外，主要是和越南茶農簽訂製作合約，以取得原料。當然，即便是小規模的經營者，自家的茶地都是二十甲起跳，算上製作茶地以後，也都有一百甲左右的規模，同樣不是國內茶農可以比擬的。

許多越南臺茶同行對這種經營方式也多有質疑，對越南茶農並不信任——事實上，就是新一輪的食品安全差異劃界。這些製作的茶廠又是怎麼樣確保品質、確保農藥管理的呢？某次訪談過程中，我們在餐桌上發現一張準備發給製作的茶農的表格，上面記載了各種農藥在臺灣允許的殘留天數和殘留量。這些製作經營者找到了一群非常有力的連結對象：農藥經銷商。製作臺商會在契約裡面規定，合作農戶必須要跟指定的農藥經銷商

6 越南臺茶與國內茶農藥檢驗的主要差異在於源頭控管。越南臺茶的部分，如同所有其他來源的進口茶，因為進口時必定需要通過海關農藥檢驗，且該階段之風險係由越南臺茶經營者負擔，因此發揮著有效的源頭控管功能。國內茶則缺乏海關一般具強制性的檢驗機構，多由農民自行送驗；但實際上，由於產量、茶地面積較小，逐季、逐批檢驗對國內茶農而言是極大的負擔。

購買農藥。此後，臺商和農藥經銷商確認不同時節農藥的配方，包括近期的主要病蟲害、天候，特別是降雨情形、採收期與殘留天數。經銷商把農藥配好之後，會定期找上這些製作的越南茶農販賣農藥。在這裡，農藥經銷商既是一個中介，在臺商與越南茶農之間中介了農藥本身和相應的技術；也同時參與了農藥管理，成為邊界穿越與鞏固的其中一環。

在越南臺茶的種植過程中，我們看見邊界穿越與鞏固的組裝初步浮現。金萱的品種特性，是越南臺茶，以及整套邊界穿越與鞏固的基礎；考量生產模式與環境條件的勞動力編制與經營模式，則是越南臺茶穿越差異劃界的生存之道。對越南臺茶經營者而言，食品安全儘管是越南臺茶最具代表性、也最廣為流傳的爭議，但卻遠遠不是最難以穿越的差異劃界。非傳統出口型作物的特徵，參與了越南與臺灣茶的食品安全的農業本土劃界；但越南臺茶的物質性，同時穿透了這個劃界。透過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或是與農藥經銷商合作，越南臺茶經營者們試圖打造出和臺灣茶一樣安全的越南茶。

五、製茶：環境適應與生產模式

種出安全的茶之後，還要把茶做好。儘管食品安全是越南與臺灣茶之間最常見的差異劃界，但似乎不是最堅實、封閉的空間與象徵性邊界。這點在訪談過程中就透露出端倪，越南臺茶經營者們談及農藥管理都是胸有成竹，手邊隨時備妥農藥殘留檢驗報告以資佐證；但是，品質卻是所有越南臺茶經營者都要猶豫再三的話題。實際上，無論是錄音筆開啓後的訪談，或是餐桌上的閒聊，經營者之間的話題，大抵上都圍繞著越南臺茶的品質負面形象與品質管理。因此，在穿越食品安全的邊界之後，越南臺茶如何面對越南的生長環境與勞動力條件，調適源自臺灣的製茶技術，就是本段要處理的物質性與邊界的題目。

（一）環境適應

圖3是一則2014年的新聞截圖。新聞將臺灣茶與越南茶並列比較，呈現

出前者價格較高、茶湯清澈、品質較好，對照後者價錢較低、茶湯混濁、品質較差的形象。品質的邊界運作，和原料出口的生產模式密不可分。越南臺茶原料出口的生產模式，源自臺灣對原料茶的需求；但是，這個因果關係並沒有被廣泛地認可，大規模、以量制價的生產模式反而成爲越南與臺灣之間品質邊界的基礎。無論如何，這則新聞對臺灣消費者再製了越南臺茶「低價爛茶」的負面形象，強化品質的邊界運作。



[東森新聞HD]台灣茶混越南茶賣 橙劑汙染源恐喝下肚

圖3：新聞中的臺灣茶與越南茶比較。（東森新聞CH51 2014）

關於越南與臺灣茶之間的品質邊界運作，或許需要回到臺灣烏龍茶的製茶過程重新檢視。根據一些投入越南茶產業的臺灣茶農、茶師的說法，十多年前的越南臺茶，確實有品質欠佳的問題，飲用時可以感覺到一股明顯可辨的「越南味」。但是，關於何謂越南味，可以說是衆說紛紜，大體而言就是諸多針對越南茶風味上的批評，從視覺、嗅覺到味覺不一而足。一位曾經在越南臺茶廠工作過的製茶師傅透露，他之所以離開越南，就是因爲大約20年前的時候，遇到無法克服的技術障礙，「茶水就是黑黑的，怎麼調整都沒辦法」。阿華，一位1980年代就以茶工的身分入行，現在也已經是茶老闆的受訪者則認爲，當年茶葉的越南味，反映了製茶技術與師傅們還在和越南的環境磨合：

研究者：臺灣這邊除了會說越南這邊農藥有問題，也會講說越南

這邊的茶做完以後喝起來會有一股，欸，跟臺灣不一樣，越南味什麼的？

阿華：以前是有，以前做茶是怎麼樣，第一是沒有技術……

研究者：以前是多以前？

阿華：欸，五六年以前，有地瓜味，茶炒不熟，萎凋不好，變有個越南味，地瓜味，是不是老闆娘？

研究者：是我們吃的地瓜？

阿華：對，地瓜葉子的味道。

阿姨：不是五六年以前，是剛開始的時候，剛剛講錯了。

研究者：所以是剛開始的時候？

阿華：十年前吼？

阿姨：十幾年前啦！

阿華：很多師傅過來不了解這個氣候

（2016年06月30日田野訪談）。

在烏龍茶的製程中，採茶之後依序會有萎凋、靜置、浪菁、炒菁、揉茶等步驟。而阿華所提到的萎凋，是要在茶葉進入靜置、氧化、發酵之前，降低其中水分。萎凋不足會導致茶葉中殘留水分過多，導致在接下來的靜置階段時，茶葉無法完整氧化、發酵。氧化、發酵沒處理好的茶，泡出來就只是葉子水，俗稱「菁味」——或許也就是這位受訪者所謂的地瓜葉味。實際上，將氧化、發酵不足的茶葉比擬為菜味或葉子味並不是阿華的一家之言，在臺灣也有用「豬菜」或是「葉子水」形容菁味的說法。阿華的答案指明了，十多年前越南茶品質欠佳的原因，是因為技術上還沒有適應當地環境。「越南味」是因為萎凋不足，水分殘餘過多，影響接下來的發酵進程，導致最終無法炒製出理想的風味。

換言之，「越南味」或品質的邊界運作，更可能是因人而異的身體感官經驗。即便如「菁味」在臺灣茶藝界已經是個普遍使用的味覺描述，依然缺乏可以一槌定音的標準，以至於交易雙方有透過品味論述進行討價還價的空間。這反映在阿華和阿姨對於越南味出現時間點的對話，即便是關係密切、也都堪稱老資格的兩位越南臺茶經營者，對於越南臺茶品質磨合

的進程、以及品味論述的採納，都有不盡相同的說法。因此，我們可以將越南味與品質，理解為盤商和經營者不斷討價還價出來的品味論述與品質實作。換句話說，品質的差異並不是因為低成本、原料生產所致，也絕對不是不可跨越的邊界的保證。

有關「越南味」的這段訪談，反映了源自低成本、大規模、原料生產的品質邊界運作實際上並不精確。從經驗現象而言，做為原料生產的越南茶，仍然可以在品質上有所精進；從抽象概念而言，越南臺茶的品質實作穿透了品質的邊界運作，穿透了重構中的臺茶本土性。下一個問題也在此浮現：原料出口生產模式下的越南臺茶，究竟如何在品質上有所精進？品味論述與品質實作，如何穿越品質的邊界？實際上，阿華對於越南味的說法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指引：回到製茶的生產過程。

（二）生產模式

在關於種茶的段落，我們曾經討論過越南茶的低成本、大規模、原料出口生產模式，如何有助於農藥管理。越南臺茶經營者們在茶葉生長條件、管制風險與物質性的組裝下，衍生出的龐大而穩定的勞動力編制，使其得以在過去20年迅速累積經濟資本，並且不斷緊跟著臺灣的各種農藥規範，穿越安全的邊界運作。實際上，越南臺茶穿越品質的邊界運作，也同樣是立基於臺灣烏龍茶的製茶過程，以及原料出口生產模式的生產條件。

何謂臺灣烏龍茶的物質性？在余舜德(2013)筆下的臺灣烏龍茶，是一門難以徹底採行工業化、科學化標準的技術與生產模式的技術。難以捉摸的發酵程度、「看天做茶」和「看茶做茶」的物質性（原文寫做物性，materiality）讓製茶者即便採用晚近研發、精進的製茶機械，也仍然無法割捨傳統的身體技藝。根據余舜德的說法，他進行田野調查的臺灣凍頂茶區仍然保有小型家庭作坊，具有以家庭為單位世代相傳的特色。身體的感官，嗅覺、觸覺、視覺、聽覺，仍然指引製茶者如何與茶葉、與現代科技共謀。

不過，面對同樣一套難以捉摸的製茶過程，身在越南，面對越南種植與勞動力條件的越南臺茶，卻走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品質之道。亨哥和劉

先生是晚近加入越南臺茶業的第二代，讓他們願意嘗試這個日薄西山的產業的，是針對製茶過程的調整空間。某次在試茶過程中，發現一支有菁味的茶時，劉先生很篤定的告訴我們，

劉：這一定是契作茶園那邊的問題。

研究者：為甚麼？大家不是都說，影響的因素很多嗎？

劉：我們現在都照SOP走，它跟其他支都不一樣，茶廠我們可以盯著，所以只會是差在茶園那邊。（2017年09月04日田野訪談）

亨哥和劉先生試圖調整出最符合大規模原料生產的品質管理。亨哥和劉先生再次強調，越南臺茶的重點不是追求某幾支特別出色的功夫茶、比賽茶，而是要確保每一支都能達到一定的水準。而越南臺茶所需的水準，就是足以符合在臺盤商的需求，再不濟，也要可以透過拼配調整茶的優缺點。因此，亨哥和劉先生選擇在茶園和茶廠落實一套標準化的作業流程，投入更多有機肥、豆肥增加養分，嚴格控制製茶流程的時間、溫度。如此一來，也許會因為沒有針對細微環境差異微調，而無法做出臺灣工藝典範下的頂尖的茶葉，但至少能確保大多數的茶葉品質都相去不遠。反正，許多越南臺茶經營者都堅信，無論越南臺茶做得再好，也難逃被盤商壓價的命運；真的做出好茶，也是拿來送禮交朋友、或是小量但高價賣給熟人比較划算。

實際上，標準化作業流程並不是只有亨哥和劉先生想到，只是調整過程中增加的成本和不確定性，以及臺灣烏龍茶的技藝傳承，讓許多經營者猶豫再三。越南臺茶經營者們做的終究是臺茶而非越南茶，臺灣製茶師傅過去20多年的技術轉移與經驗傳承也不可抹滅。這影響了越南臺茶經營者們對SOP接受程度的高低不同，有的徹底轉型，甚至取得認證，有的部分調整，有的掙扎不決——但總體而言，標準化製茶程序，犧牲手工藝的精緻品質，以追求穩定性，仍然是越南臺茶的主要方向。

面對越南的茶葉生長環境與勞動力條件，越南臺茶必須以截然不同的製茶方式，尋求穿越品質邊界的機會。若是從余舜德(2013)筆下的臺灣烏龍茶傳統技藝來看，標準化製茶流程是最離經叛道、最無視身體感官經

驗、徹底轉向秒針、瓦斯與製茶機械的製茶方式。但是當臺灣烏龍茶的品種與技術，逐漸在林同省高原上站穩腳跟後，越南臺茶經營者衍生出了嶄新方式面對臺灣烏龍茶的物質性。標準化製茶流程，就是在越南臺茶經營者、原料出口生產模式、臺灣茶葉市場、管制風險與臺灣烏龍茶物質性的組裝下，千錘百鍊出來的品質實作。越南臺茶的品質實作，確保越南臺茶得以迎合臺灣烏龍茶曖昧不清的品味論述，一次次穿越品質的邊界運作與臺茶本土性劃界。

六、賣茶：本土劃界與拼配工藝

儘管本文不斷強調，圍繞著茶葉物質性的組裝如何穿越越南與臺灣茶之間的邊界，但時至今日，臺灣茶已經被建構為一個強調本土、產地與純正性的純化商品。越南臺茶確實可以穿越邊界，雖然是不具身分、隱晦地穿越邊界，但是，相對的，從原產地標示，到更小尺度的產地認證，一系列農業政策反映了國家、縣市政府、茶業改良場等不同層級的政府對純化臺茶的支持。在銷售端，茶行、盤商依據產地和海拔區分產品價格的行為，就是臺灣茶產業現存、實際運作中的價值排序體系。

（一）本土劃界

茶藝比賽是建構純化臺茶的關鍵步驟。1970到1980年代，臺灣的綠茶出口陷入困境，開啓了內銷市場的發展。開發內銷市場的第一步，就是1975年於鹿谷首次舉辦的茶比賽，目的在於針對國內消費者建構臺灣烏龍茶作為健康、精緻，以及中華精緻飲食文化與國內技術創新的結合（陳宇翔 2007）。隨後，臺灣各主要茶區都陸續開辦各式茶比賽，除了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球形烏龍，各地特色茶比賽也逐漸出現。茶比賽不只是臺灣茶產業品質、風味上的指標，也將產地純化的尺度，從國家縮小到鄉鎮。換言之，茶比賽就是臺茶農業本土劃界的指標。

弔詭的是，茶比賽作為農業本土劃界的重要手段，茶比賽本身卻始終難以徹底斷絕越界而來的越南臺茶。早在2000年，就曾有茶商「混用」進

口茶葉，在象徵臺灣茶藝水準的茶比賽中獲取獎項：

林能德說，連日來他也接獲消息，指有越南茶、印尼茶，甚至中國大陸茶混入參賽，但依茶賽規定，新品種組不限產地，僅限制合作社會員與鹿谷鄉茶農才可參加。（陳紹聖、簡獻宗 2000/12/05）

臺灣茶比賽中出現越南臺茶，並且外觀、品質難辨，甚至得獎，並不是單獨案例。2017年亦有茶農使用越南臺茶，獲取茶比賽而遭人檢舉的新聞（張家樂等 2017/06/14）。各個茶比賽的規則各有不同，一般而言用「版」來做單位，一版需繳交報名費與10至20斤茶葉以供作為比賽樣茶、農藥殘留檢驗與農會購買。多數茶比賽受件時只認報名茶農身分，難以透過外觀區辨產地。因此，購入外地茶葉，增加版數提升入選、得獎機率，就成了各地賽茶公開的秘密。

事實上，在一般的沖泡茶消費中，使用越南臺茶拼配，以擴大產量、降低成本，也在臺灣茶產業行之有年。一則2005年的新聞報導中，描述了越南臺茶如何透過拼配或混茶成為本土烏龍茶的經過（張柏福 2005/07/10）。從2000年、2005年到2017年間層出不窮的案例，說明混茶不只是個別茶商的交易誠信問題，更反映過去近20年來臺灣茶產業隱晦但廣泛的臺越茶貿易。本土化臺灣茶產業的基礎，在於安全與品質上更為優越的形象，使其成為足以創造利益的象徵。而這個象徵，在安全與品質的邊界日漸模糊，拼配／混茶難以杜絕的情況下遭受挑戰。這個危機，則肇始於臺灣茶產業30多年來不斷減少的茶地面積與產量。由於產量不足，臺灣茶產業不得不日益依賴進口茶、尤其是越南臺茶，混入臺灣茶。不過，「混」顯然是一個本土化臺茶觀點下的價值判斷詞彙，如果回到臺灣、乃至全球茶產業的生產脈絡，或許可以重新理解此處的邊界運作情形。

（二）拼配工藝

拼配，又稱併堆、拼堆。根據茶藝辭典的說明，拼配是一種將不同的茶葉原料依據特定比例混合，以追求更好、或更複雜風味的技術(Chan 2008)。茶葉風味的構成十分複雜，即便是同一茶廠前後數天的產品，也可能因為溫度、濕度和製茶過程而不同，更不用說是不同產地、莊園、年

份、季節。隨著茶葉交易規模日益擴大，如何確保風味、品質與數量的穩定，就成了茶產業的核心考量。因此，拼配就成為全球各地茶產業追求穩定質與量的關鍵技術。

拼配同樣也深植於臺灣茶產業之中。自19世紀末茶葉引入臺灣，並且形成原料出口的種植、製作、銷售與資金體系以來，類似當代拼配的工序，即廣泛地被運用在臺灣茶產業中。當時的臺灣茶產業以臺北為加工、出口中心，在臺灣西部的丘陵地帶迅速擴展種植面積，到了甲午戰爭之前，每年的出口量已經達到千萬磅（林滿紅 1997：20、58）。當時的製茶程序，是在產地進行粗製之後，就會透過中介的茶販流入茶棧、茶館、洋行等不同精緻、外銷業者手中，加工為烏龍茶或包種茶，輾轉透過廈門、香港等地，銷往美國、英國或東南亞。在茶販的手中，茶葉會進行第一次的合併與篩選，少部分劣次品、下茶流入內銷市場，其餘則會轉售予下游的精緻外銷業者。到了出口階段，茶葉會依據品質被分級，根據1896年、日治之初的《產業調查錄》所載，當時的洋行、茶商時將茶分為以下八個等級，是以片假名書寫的英文單字，例如價位最高的兩者分別是チョイセスト（choicest，最精選）、チョイスト（choice，精選），其後還有シュペリオル（superior，優異）、グード（good，好）、コンモン（common，普通）等（臺灣總督府 2001：29）。我們無法斷言，當時是否所有茶葉都是在這套品質標準之下分類、銷售，因為調查報告中並沒有包括極少數最高級的茶葉；但是可以確信的是，茶葉的製程，大體而言就是一個不斷重複將不同來源的茶葉混合，而後依據品質分級的過程。如同資深茶人、現任製茶公會理事長解釋為何需要拼配，「一整年都有單，你能夠不拼嗎？春茶和夏茶的味道就不一樣，你能夠分開賣嗎？當然是要把年頭到年尾拼在一起，用同一個味道、品質來賣。」（2017年07月03日田野訪談）龐大而穩定的出口額，讓臺灣茶產業必須拼配。

和百年前相比，臺灣茶產業所行的拼配，除了技術上更為細膩，最大的差異在於更複雜的產地來源：以越南臺茶為主，其他來自中國、東南亞各地。1980年代，由於外銷市場競爭激烈，臺灣茶產業開始著手開發內銷

市場，從此逐漸由原料出口轉向本土形象濃厚的精緻內銷與飲料產業。同時，由於土地成本上升以及勞動力外移、老化，北部丘陵的原料茶產區逐漸走向減產、休耕。但是臺灣茶產業對於低價原料茶的需求並沒有消失，甚至隨著本土化臺灣茶產業的擴張而增加。填補原料茶需求缺口的，就是佔據土地、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越南臺茶。臺灣茶產業的拼配從此更加複雜，從國內不同產地間的混合與分裝，走向跨國的混合與分裝。

對於許多拼配的採行者，包括一些茶行業者、越南臺茶經營者、以及茶葉研究者，心目中的答案都是全球知名的茶葉品牌「立頓」。在這一派的說法中，臺灣茶產業的前路在於透過品牌打造與拼配技術，擴大規模，重建出口市場。陳老師，一位資深茶師、茶藝作家認為，像是立頓的專業拼配，和臺灣人人喊打的混茶是不一樣的：

亂配叫做混啦。比方立頓，立頓世界知名品牌，英國嘛，英國出茶嗎？對啊，英國沒出茶，英國就比方說在中國買，在越南買，在印尼買在印度買在各地地方買，他的茶師在買來以後，泡泡以後，各個地方的茶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配成一個配方，變成一個 at number。這個 at number 就是說每年都穩定，比方 a101，這個 at number，到每年你去買這個它品質都一樣，這就是它的 know how……其實這就是說，要透過進來，拼配，臺灣變成一個英國，像立頓，就一個拼配中心，一個大公司願意去做這個事情。把拼配，建立一個品牌，然後品牌裡面又有一些產品，把它規格化，然後行銷到世界。（2015年05月22日田野訪談）

在陳老師心目中，作為一門專業技術的拼配，和不誠實的混用茶葉原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兩件事情。陳老師對拼配的描述，大體和本段開頭引用的茶藝辭典雷同，是為了一定的產量、成本與風味，將不同來源的茶葉原料，依據特定的比例混合。而拼配的支持者，也經常透過描述拼配的應用，提出一個立基於全球農食體系下的產業發展與農業政策想像。這個全球的臺灣茶產業與農業想像，實際上就是在提出另一套農業本土的劃界模式，不在乎封閉與鞏固，而是廣納越界的事物，重構臺灣茶產業。

然而，這套將拼配視為提升品質、廣納越界的關鍵技術，無疑威脅了1975年茶比賽開辦以降、透過純正性的打造而帶來的臺茶本土化市場。亨哥和劉先生曾經讓我們旁觀拼配的過程，那次剛好進來了11支茶，金萱、

翠玉、四季春、青心烏龍都有，金萱最多，青心烏龍最少。在試茶的過程中，亨哥和劉先生就開始做第一次篩選，有一支金萱做得很好、有標準發酵出來的牛奶糖香，不用拼就可以賣；比較多的情況是有一些小缺陷，稍微不夠香、不夠綠或茶湯不夠厚，這些比較好調整；還有一些問題比較嚴重，有菁味，下午要花點心思處理。例如，某幾支拼在一起，拼出翠玉的風味，剛好賣給某位偏好翠玉的茶商；另外幾支則是修出綠得很漂亮的茶湯，就可以連絡某一位偏好輕發酵的合作對象；當然，越南臺茶拼配的最高境界，就是用金萱等不同茶種，拼出青心烏龍的味道。阿姨和阿湧也告訴我們，做比較好的就用各種方式賣出去；沒做好、或是茶季尾聲機採的茶菁，就賣給飲料茶商。透過拼配技術的應用，越南臺茶找到了穿越本土、道地與純粹的象徵邊界的方法。他們瞄準共享臺灣茶產業這塊品質與風味的金字招牌下各個等級的市場：以中低價位沖泡茶為主，因此要具備充足的量與穩定的品質、風味；以低價飲料茶為輔，確保不符標準也無法以拼配調整的茶不會堆庫存；最後，還有極少數出類拔萃的產品，甚至會被臺灣茶農、茶商混進高價茶、比賽茶之中。拼配讓越界得以可能，也動搖了本土化臺茶賴以牟利的純正性，從此讓越南臺茶從臺灣茶產業的補充，落為必須嚴陣以待的頭號威脅。

在邊界運作的觀點下，拼配技術的爭議，串連了種茶、製茶到賣茶的邊界運作過程。臺茶品種的物質性，以及管制風險考量下的農藥管理策略，確保越南臺茶得以穿越食品安全的邊界。同樣也是臺茶的品種特性，結合臺灣的市場需求與越南的生產與勞動條件，在臺灣經營者與越南茶工的互動與張力下生成越南臺茶製茶的每日實作，確保越南臺茶得以跨越品質的邊界。最終，茶的身體感官經驗與市場需求聯集而成拼配技術的應用，讓越南臺茶穿越農業本土的邊界運作。不同行動者、茶的品種特性、生長條件、勞動力配置與生產模式、市場需求、管制風險，諸多越南到臺灣、日常到邊界、跨國到在地、行動到結構，組裝出的邊界穿越與鞏固的效果。當代的臺茶農業本土，由此不再只是對內價值建構與詮釋，更是穿梭往返邊界、跨越人與非人的在地化與再在地化過程下，共構的邊界穿越與鞏固的效果。

七、結論：本土臺灣茶與境外越南茶的通路組裝

拼配技術的應用，看似讓越南臺茶得以穿越邊界，隱晦地與國內茶一同構成當代臺茶農業本土的物質性基礎；但是，邊界永遠是個過程，新的物質性考量可能正在重構越南與臺灣茶之間的邊界。反對越南臺茶的國內茶業經營者、部分國家行動者與學者，爲了壓制拼配技術，進而重塑封閉而鞏固的農業本土劃界，同樣針對茶的物質性採取行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爲，就是近年逐漸完善、並且進入應用階段的DNA分析。混茶，或說拼配對本土臺茶的威脅，來自於再本土化的越南臺茶成功組織起經營者與茶工、生產模式、市場取向與價值、管制風險與臺灣烏龍茶物質性，穿越食品安全或品質的邊界，挑戰臺茶農業本土。爲了更直接地區辨茶葉原料的產地，臺灣相關技術單位轉向量化的物質性標準，試圖從生物科學的取徑提煉茶葉物質性，而非過去仰賴的感官經驗。技術開發單位宣稱，該技術已經能夠有效區辨臺灣、越南與其他主要進口來源茶葉的DNA片段差異。2017年的茶比賽事件，就是以DNA分析技術作爲主要罪證。如果說，拼配，是透過基於茶諸多面向的物質性考量而產生的一種邊界穿越技術，那麼DNA檢定，就是摒棄農藥殘留或是身體感官，專注在生物科學意義上的物質性的農業本土劃界技術。

DNA分析技術，揭示了再次邊界化鞏固本土臺灣茶的開始，境外越南茶如何因應才能再啓越界移動的動能？當然，這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畢竟茶的物質性如何在邊界鞏固的力道中再次連結出不同人與非人的組裝，讓越界得以發生，是個持續不斷的動態過程，而邊界與移動也藉此不斷地重組互爲表裡的關係。

晚近關於邊界的討論中，邊界不再只是"a line on the sand"(Newman 2006)，更是一種空間－領域策略(Jones and Johnson 2014: 8)，也就是攸關主權、秩序與安全的領域化(Hung and Baird 2017)實踐。邊界研究開始關注政治邊界以外，更廣泛的分類建立、分化與劃界。如前所述，邊界不再只是邊界線及其周圍的邊界地帶，更指涉了社會中的邊界化過程；不是協商與實踐的穩定狀態，而是回溯邊界生成之前與之後。因此，邊界研究不再

只是關注分類的建立與分化，更要分析這些分類如何被國家與非國家行動者參與及理解。

在大量越南茶進入臺灣後，對國內茶農、茶商造成極大的經濟衝擊，拼配、混茶也嚴重影響臺灣茶的本土形象。當邊界始終難以發揮排除的效果，非國家行動者——茶農、茶商——於是開始透過論述越南茶的負面形象，以食品安全、品質風味、經濟與象徵的劃分方式，和國家邊界疊合，重新操作一個穩固的空間領域策略，本土成為領域化臺灣茶的驅力，排除任何在臺灣島外生產的茶，純化、本質化並物質化臺灣茶的國族空間想像。

茶的物質性，透過人與非人之間非線性的組裝，越界或鞏固整個邊界化過程。不只國家行動者試圖透過物質性因素從事邊界治理，非國家行動者同樣可以透過操作物質以涉入邊界運作。邊界的空間—領域化，是一套由人與非人緊密扣連的封閉、穿越或兩者兼備的策略；沒有獨處於邊界的人或非人，而是由人與非人共同形構的邊界化過程。對越南茶而言，跨越邊界進入臺灣最大的障礙經常不是國家實體邊界上海關的農藥管控，而是要透過品質說服臺灣的買家；而所謂越南茶的品質，就是和臺灣同季同類茶種的相似程度。因此，浪菁滾筒的轉動速率，炒菁的火力與火候，還有揉茶成形的細緻程度，這些牽涉茶葉物質性不同層次的實踐，經常是深刻鑲嵌在風土之上，例如當天、當季天候與茶葉生長情形，都會影響到越南茶能否順利跨越臺越國家邊界。

茶的物質性牽起非線性的人與非人組裝，讓越南茶鬆動臺灣茶的本土劃界，移動進入臺灣的通路，形成越界商品的通路組裝(circulation assemblage, Salter 2013)。但如同索特(Mark Salter)主張的，通路組裝與移動管理息息相關。臺灣茶的本土劃界，便是對越南茶的移動管理，一體兩面；然而，茶的物質性讓通路組裝不可預期、多樣、持續變動，藉此以不同的力量鬆動臺灣茶的本土劃界，以致於對移動的管理也必須持續不斷地更新。在這些過程裡，茶儼然不止是一種飲品，也是個充滿政治性的物；從栽種一株茶樹到啜飲一口茶湯，都啟動了本土與境外、邊界與移動互為表裡的實踐過程。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作者不詳〉[unknown author]。2004/12/12。〈大陸茶 越南茶 趁虛搶市〉“Dalu cha yuenan cha chenxu qiangshi” [Chinese tea and Vietnamese tea seize Taiwanese tea market]，《民生報》*Minsheng bao*，A1版 [Page A1]。
- 〈作者不詳〉[unknown author]。2015/04/23。〈手搖飲料店多用越南茶 「碎形紅茶」一杯成本僅2元〉“shouyao yinliao dian duo yong yuenan cha 「sui xing hongcha」 yi bei chengben jin 2 yuan” [Handmade beverage shops often use Vietnamese tea; the cost of a cup of black tea is only 2NTD]，《ETtoday新聞雲》*ETtoday xinwen yun* [ETtoday News Cloud]。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423/497098.htm。(accessed 2018/01/30)
- 〈作者不詳〉[unknown author]。2015/04/24。〈進口大宗「越南茶葉」問題多 徐焱煌：食藥署早知道〉“jinkou dazong 「yuenan chaye」 wenti duo” Xu Qin-huang：FDA zao zhidao [Vietnamese tea, the mainstream of tea importation, is doubtful; Xu Qin-Huang: FDA has already known it.]，《ETtoday新聞雲》*ETtoday xin wen yun* [ETtoday News Cloud]。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424/497325.htm。(accessed 2018/01/30)
- 〈作者不詳〉[unknown author]。2015/05/13。〈中國茶混越南茶來台怎麼抓？官員：「看起來都一樣」〉“zhongguo cha hun yuenan cha lai tai zenme zhua? guanyuan: 「kan qilai dou yiyang」” [how to detect the mixture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tea? Bureaucrat: they look like the same]，《自由時報》*Ziyou shibao* [Liberty Times]。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16451。(accessed 2018/01/30)
- 丁國鈞 (Ding Guo-jun)。2015/09/23。〈1斤1萬2 霸占國土年削上億 雪烏龍茶園爆混茶矇騙〉“1 jin 1 wan 2 bazhan guotu nian xue shang yi xue wulong chayuan bao huncha mengpian” [Snow Oolong tea garden, sold in 12000NTD per catty and earned over hundred million, illegally occupied state-owned land and cheated by mixing tea]，《壹週刊》*Yi zhoukan* [Next Magazine]。http://www.nextmag.com.tw/realtimenews/news/26396115。(accessed 2018/01/30)
- 丁萬鳴 (Ding Wan-ming)。1999/06/10。〈進口茶葉 將檢測農藥殘留〉“Jinkou chaye jiang jiance nongyao canliu” [Imported tea will have to undergo pesticide residue testament]，《聯合報》*Lian he bao* [United Daily News]，03版 [Page 03]。
- 王淑瑛 (Wang Shu-ying)。1995/04/29。〈農委會反對進口大陸茶〉“nongweihui

fandui jinkou dalu cha” [Council of Agriculture oppose on importing Chinese tea], 《民生報》 *Min sheng bao*, 18版 [Page 1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Council of Agriculture)。日期不詳[unknown date]。《農業統計資料查詢》 *Nongye tongji ziliao chaxun* [Agricultural Statistical Data Inquire]。 <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03>。(accessed 2018/01/3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2004。《植物保護圖鑑系列4——茶樹保護》 *Zhiwu baohu tujian xilie 4-chashu baohu* [Series of Illustration of Botanical Protection 4-Tea Tree Protection]。臺北(Taipei):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2016。〈輸入茶葉邊境查驗結果〉 “Shuru chaye bianjing chayan jieguo” [Result of testament of customs of import tea]。 <https://www.mohw.gov.tw/cp-2628-19170-1.html>。(accessed 2018/10/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Tea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2008。〈越南茶產業調查〉 “Yuenan cha changye diaocha” [Investment of Vietnamese tea industry]。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09903368/001>。(accessed 2018/10/12瀏覽)

——。〈日期不詳〉(unknown date)。〈品種特性簡介〉 “Pinzhong texing jianjie” [Introd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of varieties]。 <http://www.tres.gov.tw/view.php?catid=1668>。(accessed 2017/09/21)。

余舜德(Yu, Shuenn-der)。2013。〈臺灣凍頂烏龍茶之工匠技藝，科技與現代性〉 “Taiwan dongding wulong cha zhi gongjiang jiyi, keji yu xiandaixing” [Craftsmanship,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of Taiwan dongding oolong tea production]，〈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renlei xueka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1(1): 123-153。

吳淑娟(Wu, Shu-juan)。2007。《戰後臺灣茶葉的發展與變遷》 *Zhanhou taiwan chaye de fazhan yu bianqian*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Tea Industry in Taiw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Guoli zhongyang daxue lishi xuexi shuoshi lunwen) [MA.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Graduate, Taiwan]，未出版[unpublished]。

呂天頌、張家樂、林玉文、謝恩得(Lu, Tian-song, Zhang Jia-le, Lin Yu-wen, Xie Ende)。2007/05/16。〈進口茶「臺灣化」本土茶恐泡沫化〉 “Jinkou cha 「taiwan hua」 bentu cha kong paomo hua” [“Taiwan-ization” of imported tea might depresses domestic tea industry]，〈聯合報〉 *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A8版 [Page A8]。

李登輝 (Lee, Teng-hui)。2015。《新·臺灣的主張》*Xin · taiwan de zhuzhang* [*New-With the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t*]。臺北 (Taipei): 遠足 (Walkers Culture)。

周小仙 (Zhou Xiao-xian)。2007/07/27。〈臺灣產不足 茶飲料多混茶〉“Taiwan chan buzu cha yinliao duo huncha” [Taiwanese tea production is not enough, most of the beverage tea often uses imported tea]，《聯合報》*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A8版 [Page A8]。

孟祥傑 (Meng Xiang-jie)。2009/12/11。〈大賣場自有品牌越南茶葉充臺灣茶〉“Da maichang ziyou pinpai yuenan chaye chong taiwan cha” [Shopping mall’s private brand mixes Vietnamese tea into Taiwanese tea]，《聯合晚報》*Lianhe wanbao* [*United Evening News*]，A1版 [Page A1]。

——。2009/12/12。〈越南茶混充標臺灣茶限期改善〉“Yuenan cha hunchong biao taiwan cha xianqi gaishan” [Vietnamese tea mixed and labeled as Taiwanese tea, correction required]，《聯合報》*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A8版 [Page A8]。

東森新聞CH51 (EBC News)。2014/11/04。〈臺灣茶混越南茶賣 橙劑污染源恐喝下肚〉“Taiwan cha hun yuenan cha mai chengji wuranyuan kong he xia du” [Taiwanese tea was mixed with Vietnamese tea; Agent Orange might be drunk]。

林進修 (Lin Jin-xiu)。2009/11/16。〈下架回收〉“Xiajia huishou” [Recalled.]，《聯合晚報》*Lianhe wanbao* [*United Evening News*]，A8版 [Page A8]。

林鼎盛 (Lin, Ding-sheng)。2007。《新式臺灣茶飲的社會學分析》*Xinshi taiwan chayin de shehuixue fenxi*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New Taiwan Tea*]。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hualian jiaoyu daxue shehui fazhan yanjiu suo shuoshi lunwen) [MA.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tional Huali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未出版 [unpublished]。

林滿紅 (Lin, Man-hong)。1997。《茶、糖、樟腦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 (1860-1895)》*Cha, tang, zhangnao yu taiwan zhi shehui jingji bianqian (1860-1895)* [*Tea, Sugar, Camphor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aiwan (1860-1895)*]。臺北 (Taipei): 聯經 (Lian jing) [Linking]。

邱念渠 〈Chiu, Nian-qu〉。2005。《臺灣茶葉產業的演進過程與發展困境》*Taiwan chaye chanye de yanjin guocheng yu fazhan kunjing* [*Tea Industry in Taiwan: Evolution and Predicament*]。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學位論文 (Guo li tsinghua daxue gongye gongcheng yu gongcheng guanli xuexi xuewei lunwen) [Undergraduate thesis,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未出版 [unpublished]。

- 邱莞仁 (Qiu, Wan-ren)。2015/04/26。〈越南臺商喊冤：種的茶多銷歐日〉
“Yuenan tai shang hanyuan: zhong de cha duo xiao ou ri” [Taiwanese
merchants in Vietnam argue that most their tea is sold to Europe and Japan],
《聯合報》 *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 A5版 [Page A5]。
- 侯俐安、陳雨鑫 (Hou Li-an and Chen Yu-xin)。2015/04/26。〈進口茶加工產地
可標臺灣〉 “jinkou cha jiagong chandi ke biao Taiwan” [Imported tea and
processed in Taiwan can be labeled as domestic production], 《聯合報》
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 A5版 [Page A5]。
- 范振和 (Fan Zhen-he)。2005/07/01。〈臺灣高山茶 越南茶混充〉 “Taiwan
gaoshan cha yuenan cha hunching” [Vietnamese tea was pretended as
Taiwanese high-mountain tea], 《聯合報》 *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 C2版 [Page C2]。
- 凍頂工作站、李嘉雯、黃玉如、黃正宗 (Tea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Tunding Branch, Li Jia-wen, Huang Yu-ru and Huang Zheng-zong)。2015。
〈從農藥殘留檢驗談茶葉安全〉 “Cong nongyao canliu jianyan tan chaye
anquan” [Pesticide residue testament and food safety of tea], 《茶業專訊》
Chaye zhuanxun [Tea Industry Express] 93: 9-10。
- 張明慧、張家樂 (Zhang Ming-hui and Zhang Jia-le)。2009/12/12。〈本地茶農難生
存 境外臺茶回銷 只是開始〉 “Bendi chanong nan shengcun jingwai taicha
huixiao zhi shi kaishi [domestic tea farmers are unsustainable; the comeback of
foreign Taiwanese tea has just begun], 《聯合報》 *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 A8版 [Page A8]。
- 張柏福、廖肇祥 (Zhang Bai-fu and Liao Zhao-xiang)。2005/07/10。〈交易誠
信 政府該插手管管〉 “Jiaoyi chengxin zhengfu gai chashou guan guan”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commercial integrity], 《聯合報》 *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 A6版 [Page A6]。
- 張柏福 (Zhang Bai-fu)。2005/07/10。〈7成高山茶 疑摻低價茶〉 “7 cheng gaoshan
cha yi chan dijia cha” [70 percent of high-mountain tea was probably mixed
with cheap tea], 《聯合報》 *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 A6版 [Page
A6]。
- 張家樂、紀文禮 (Zhang Jia-le and Ji Wen-li)。2011/12/13。〈蘇嘉全關心農民 允
諾集水區承租〉 “Su Jia-quan guanxin nongmin yunnuo jishuiqu chengzu”
[Vice-president candidate Su shows concerns over farmers and promises to
allow land renting in catchment area], 《聯合報》 *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 B1版 [Page B1]。

- 張家樂、陳紹聖 (Zhang Jia-le and Chen Shao-sheng)。2007/04/12。〈進口衝擊上千茶農決北上陳情〉“Jinkou chongji shang qian chanong jue beishang chengqing” [Tea farmers announce to march to north to protest against imported tea]，《聯合報》*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C1版 [Page C1]。
- 張家樂、黑中亮、張宏業 (Zhang Jia-le, Hei Zhong-liang and Zhang Hong-ye)。2017/06/14。〈越南茶冒凍頂參賽得獎價暴漲〉“Yuenan cha mao dongding cansai dejiang jia baozhang” [Vietnamese tea makes great profit after win the prize of tea competition through pretended as Taiwanese tea]，《聯合新聞網》*Lianhe xinwen wang* [*UDN.com*]。https://udn.com/news/story/7320/2522729。(accessed 2018/01/30)
- 張家樂 (Zhang Jia-le)。2007/05/29。〈立委下鄉茶農焚越南茶抗議〉“Liwei xiaxiang chanong fen yuenan cha kangyi” [Legislators go to countryside; tea farmers burn Vietnamese tea to protest]，《聯合報》*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C2版 [Page C2]。
- 張振峰 (Zhang Zhen-feng)。2015/04/26。〈南投茶農叫屈：合格率逾九成〉“Nantou chanong jiaoku: hege lv yu jiucheng” [Nantou’s tea farmers argue for they have 90% pass rate in pesticide residue testament]，《臺灣時報》*Taiwan shibao* [*Taiwan Times*] http://www.twtimes.com.tw/index.php?page=news&nid=484042。(accessed 2018/01/30)
- 陳宇翔 (Chen Yu-xiang)。2007。〈從烏龍茶到高山茶：臺灣茶壟斷租的社會建構〉“Cong wulong cha dao gaoshan cha: taiwan cha longduan zu de shehui jiangou” [Taiwanese Tea: A Case of Monopoly Rent by Social Construction]，《臺灣社會學刊》*Taiwan shehui xuek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9: 107-157。
- 陳紹聖、簡獻宗 (Chen Shao-sheng and Jian Xian-zong)。2000/12/05。〈越南茶跨海參賽反銷臺灣〉“Yuenan cha kuahai cansai fan xiao Taiwan” [Vietnamese tea participates Taiwanese tea competition and is sold back to Taiwan]，《聯合報》*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18版 [Page 18]。
- 曾雅玲 (Zeng Ya-ling)。2011/10/20。〈立委質疑越南茶偽裝臺灣茶〉“Liwei zhiyi yuenan cha weizhuang taiwan cha” [legislators concern that Vietnamese tea was pretended as Taiwanese tea]，《聯合報》*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A6版 [Page A6]。
- 程遠述、陳秋雲、陳皓嫻、黃宏璣 (Cheng Yuan-shu, Chen Qiu-yun, Chen Hao-yan and Huang Hong-ji)。2015/04/23。〈英國藍農藥茶多項來自越南〉“Yingguo lan nong yaocha duo xiang laizi yuenan” [Much of Stornaway’s pesticide tea come from Vietnam]，《聯合報》*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A3版 [Page A3]。

臺灣總督府著，徐英祥譯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Hsu Ying-hsiang trans.)。2011。《臺灣茶葉調查報告譯集》*Taiwan chaye diaocha baogao yiji* [Translated Collection of Investigation Reports of Taiwanese Tea Industry]。臺北 (Taipei)：臺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Taiwan qu zhicha gongye tongye gonghui) [Taiwan Tea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潘美玲 (Pan, Mei-lin)。2012。〈【茶域經緯】越南茶？臺灣茶？尋找消失的進口茶〉“【Chayu jingwei】Yuenan cha? Taiwan cha? Xunzhao xiaoshi de jinkou cha” [【Review on tea industry】Vietnamese tea? Taiwanese tea? Looking for the missing imported tea]，《經典雜誌》*Jingdian zazhi* [Rhythms Monthly]，第165期 [Vol. 165]。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12418。(accessed 2018/01/30)

蘇怡如 (Su Yi-ju)。2011。《飲料茶產業與名間鄉茶葉產銷體系的變遷》*Yinliao cha chanye yu Mingjian xiang chaye chanxiao tixi de bianqi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ystem and the Tea Drinks Industry in the Min-jen Township]。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位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dilixue xi xuewei lunwen) [Undergraduate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未出版 [unpublished]。

二、外文書目

Adey, Peter. 2010. *Mo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Amoore, Louise, Stephen Marmura and Mark Salter. 2008. “Editorial: Smart Borders and Mobilities: Spaces, Zones, Enclosures,” in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5(2): 96–101.

Bennett, Jane.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Brown, J. Christopher. and Mark Purcell. 2005. “There’s nothing inherent about scale: political ecology, the local trap,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in *Geoforum*, 36(5): 607-624.

Chan, Kam Pong. 2008. *A glossary of Chinese Puerh tea*. Taipei: Wushing

Cooper, Anthony, Chris Perkins and Chris Rumford. 2014. “The Vernacularization of Borders,” in *Placing the Border in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R. Jones and C. Johnson, pp.15-32. Burlington: Ashgate.

Cresswell, Tim. 2010. “Towards a politics of mobility,” 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8: 17-31.

———. 2012. “Mobilities II: Still,” 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6: 645–653.

- Deleuze, Giles and Felix Guattari. 1987(1980).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Déry, Steve. 2000. "Agricultural colonisation in Lam Dong province, Vietnam," in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1(1): 35-49.
- DuPuis, Melanie, and David Goodman. 2005. "Should We Go 'Home' to Eat?: Toward a Reflexive Politics of Localism," i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1(3): 359-371.
- Feagan, Robert. 2007. "The place of food: mapping out the 'local' in local food systems," 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1(1): 23-42.
- Galt, R. E. 2008. "Pesticides in export and domestic agriculture: Reconsidering marketorientation and pesticide use in Costa Rica," in *Geoforum*, 39(3): 1378-1392.
- Galt, Ryan. 2014. *Food systems in an unequal world: Pesticides, vegetables, and agrarian capitalism in Costa Ric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 Guthman, Julie. 2014. *Agrarian Dreams: The Paradox of Organic Farming in California, 2nd e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Heyman, Josiah and Hilary Cunningham. 2004. "Special Issue: Movement on the Margins: Mobility and Enclosures at Borders," in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11(3): 287-287.
- Hung, Po Yi and Ian G. Baird 2017. "From soldiers to farmer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Chinese Kuomintang territorializ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 in *Political Geography* 58: 1-13.
- Jones, Reece and Corey Johnson. 2014. *Placing the Border in Everyday Life*. Burlington: Ashgate.
- Jones, Reece. 2009. "Categories, borders, and boundaries," 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3(2): 174-189.
- . 2010. "The spatiality of boundaries," 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2): 263-267.
- Kopytoff, Igor. 1986. "The Cultural Biographies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a Process,"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 Appadurai, pp.64-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Krishna, Sankaran. 2003. "Boundaries in Question," in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edited by John La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pp.302-314. Malden: Blackwell.

- Lam, Vien. 2014/11/18. "Vietnam dismisses Taiwanese media reports on dioxin-tainted tea," in *Thanh Nien News*. <http://www.thanhniennews.com/business/vietnam-dismisses-taiwanese-media-reports-on-dioxintainted-tea-34163.html>. (2018/01/30 last accessed)
- Moore, Adam. 2008. "Rethinking scale as a geographical category: from analysis to practice," 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2): 203-225.
- Newman, David. 2006. "Borders and Bordering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9(2): 171-186.
- Ngoc, D. V. 2012. "Breeding of tea plant (*Camellia sinensis*) in Vietnam," in *Global Tea Breeding*, edited by L. Chen, Z. Apostolides, and Z. M. Chen, pp. 241-262. Springer: Berlin and Heidelberg.
- Ong, Aihwa and Stephen J. Collier. 2004. *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xford: Blackwell.
- Phuoc, Duc, Hong Pham, Ha Dang Thanh, Thuy Nguyen Ngoc, Van Du Le, Hung Pham Trinh, Maria Victoria O. Espaldon, and Annielyn O. Magsino. 2006. "Impacts of Changes in Policy and Market Conditions on Land Use, Land Management and Livelihood Among Farmers in Central Highlands of Vietnam." presented at Sustaining Upl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Issues, Tools, and Institutions for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Conference, ACCEED,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May.
- Richardson, Tim. 2013. "Borders and Mobilitie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in *Mobility* 8(1): 1-6.
- Rumford, Chris. 2006. "Theorizing Borders: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9(2): 155-169.
- Salter, Mark. 2013. "To make move and let stop: Mobility and the assemblage of circulation," in *Mobility* 8(1): 7-19.
- Sur, Malini. 2013. "Through Metal Fences: Material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ity at Borders," in *Mobility* 8(1): 70-89.
- Walker, Rob. 1993.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